

穷,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却并没有对究竟什么是“文化软实力”做出非常明确、具有比较充分的学理性依据的界定,而是要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避而不答,要么仍然继续照搬泰勒式的文化定义而进行泛泛而谈,其结果是既没有做出具有理论深刻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研究结论,也没有对以往一直存在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方面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做出具有任何实质性推动作用的改进或者突破,因而仍然停留在众说纷纭、止步不前的状态。

出现这种研究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脱胎于泰勒文化定义的主流文化观不仅根本无法把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确切地揭示出来,反倒是把这样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遮蔽了。这样一来,只要研究者无法真正说清楚“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其对“什么是文化软实力?”“文化何以具有软实力?”“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及“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出什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结论了。显然,确切地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是探讨和研究“文化软实力”及其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前提;对什么是“文化”的理解不同,自然会导致有关“文化软实力是什么”的不同观点,由此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必然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承认一般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都不是与现实无涉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具有隐而不显但却实实在在的现实诉求,只要我们承认探讨和研究“文化与人化”并正确回答“文化究竟是哪一种人化?”问题,是推动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走向实质性学术突破的基本方向,而明确回答“由谁

来进行这种作为‘人化’的‘文化’?”“对谁进行这种作为‘人化’的‘文化’?”“利用什么手段进行这样的‘文化’?”以及“进行这样的‘文化’的目的何在?”这些问题则是使这种学术突破有可能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具有动态性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人化”过程的“文化”过程本身,实际上也就是某一个民族国家通过充分开发和发挥其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吸引力,潜移默化地对其他民族国家及其具体成员的精神世界施加特定影响的过程;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行文至此,作为一篇笔谈的本文无疑已经够长的了。总之,作为本次“文化哲学发展论坛”的主标题和副标题,“文化与人化”和“从文化软实力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反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本质相关联:它们不仅都以研究者确切地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为基本前提,实质上也都包含着强烈的现实诉求,只不过前者对这种诉求的表现比较间接,而后者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已;因而,探讨和研究这两者及其本质性关联,实际上有助于我们推动今天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不断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1318
- [2] 庞朴.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M].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 [3]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2

谈谈“软实力”概念

李 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世界哲学》主编)

本次哲学论坛引入了“文化软实力”概念,这是当今政治传媒领域的热门话题,原本无需哲学的深究。但看了一些资料后,我却对它产生了兴趣——概念澄清的兴趣。首先从字面来看,“文化软实力”的说法形成于对西方学者说法的不准确翻译,而这个不准确译

法在我们的政治传媒领域居然又衍生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新概念。此外,从内容层面来看,“文化软实力”一词把强烈的“实力角逐”意识代入对文化或传统的理解,这也是需要做必要约束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如此含混的概念居然如此流行,这也透露了虚假创新的一个特点,即因含混而出新。无论怎样,这里不妨把对这个概念的澄清当作一桩哲学家的公益行为。

先看看“文化软实力”这个词是如何炼成的。

我们知道,“文化软实力”译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的“软实力 (soft power)”,后者与“硬实力 (hard power)”是一对孪生术语。“硬实力”是指可以用硬指标测度的经济或军事力量,约瑟夫·奈

因之又称其为“强制力”(coercive power)。相对而言,“软实力”更多体现为由得人心的价值观、合宜的政治准则或良性的对外政策所彰显出的文化影响力,约瑟夫·奈因此也把它表述为“诱致力”或“吸引力”(cooptive power)。

显然,在约瑟夫·奈的用法中,“软实力”中的“软”已然是“文化”的同义语,因此汉译“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无疑是个赘疣!事实上,在英文文献中,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经常会代换为文化实力(cultural power),但那里鲜有文化软实力(cultural soft power)这样近似同语反复的表述(至少在约瑟夫·奈的文本中如此)。有趣的是,由于“文化软实力”在中国政治传媒中大行其道,它的英译cultural soft power竟带着中国特色“倒流”回英语世界,这也算是一个有趣的翻译现象。

更有趣的是,一个误译还会衍生出一系列误读!近来有人针对“文化软实力”又推演出“政治软实力”的概念:“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构成‘文化软实力’,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政治价值观、国家战略、对外政策、领袖意志的号召力、影响力则构成‘政治软实力’。”(参见2008年2月人民论坛贾立政的文章:《“中国奇迹”的期待:从政治软实力看中国的强盛》)^[1]这里姑且不论所谓“领袖意志的号召力”这类表述多么突兀怪诞并可能引发多少不良的记忆,仅就其概念衍生方式来说,就足以使人们领略我国政治传媒领域中的某些理论“创新”是何等浮躁和随意。出于同样的逻辑,“经济软实力”、“教育软实力”、“体育软实力”等不伦不类的说法层出不穷。

当然,如果仅限定在政治传媒领域,“文化软实力”这个译名是否准确,其概念内涵是否清晰,本来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要把它引入文化哲学,就要想想它是否禁得起哲学的推敲。我注意到,与以往谈论的“文化”概念不同,“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有两个新特点:第一,它高度强调文化的地缘属性或共同体属性;第二,它高度强调地缘文化共同体(如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实力竞逐”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着“权力竞逐”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英语中的power既可译为“实力”也可译为“权力”。正因为这样,我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2005年推出的一个约瑟夫·奈的译本就冠名为《硬权力与软权力》。不用说,汉语中的“实力”与“权力”确有一些内涵是重合的,但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这个差

别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某种地缘文化的“影响力”是源于其内在品质,还是依赖于某种外在手段?

“权力”明显是以征服或控制为基本目的,以算计或机巧为基本运作方式。因而从“权力竞逐”角度谈论“文化”不免会有两个偏向:第一,它把某一地缘“文化”当作虏获人心或心灵殖民的资源;第二,它相信某一地缘“文化”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外部传播手段是否足够强大。换句话说,人们会认为打造传播手段是争夺文化权力的首要选择。

需要强调,这里无意否定文化传播手段对文化发展尤其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并且我们也完全承认,对我们这个过去不太注重文化投入的国度,加大文化资金投入,改善相应传播手段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依然要指出,那种认为文化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传播手段的看法是一个极大的误导。殷鉴未远,原苏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原苏联自1929年起开办对外广播,最初其语种只有德语、法语和英语,1933年增加到9个。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竟达到75种(中国如今是40余种)!这个数字至今仍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些数据决不表明这个国家获得了真正的“文化权力”或“软实力”。事实上,1986年后仅仅5年,它便宣告解体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非得在“竞逐”意识下观察地缘文化的影响力,那也应当意识到,“权力竞逐”的最终基础是“价值竞逐”。事实上,约瑟夫·奈在界定“软实力”概念时首先强调的就是“价值”概念。正是这种价值确定了某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吸引力或感召力。什么叫“吸引力”或“感召力”?十年前,美国人奈斯比特针对当时流行的高科技(high tech)一词发明了high touch的说法,汉语译界把它通译为“高文化”,这个译法在我看来未能尽善。实际上,汉语对high touch早已有个现成的对应语,那就是“直指人心”。“直指人心”是文化魅力或文化影响力的真正的和终极的根据。中国古人说“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这个说法虽极端却不失根本。对一种地缘文化或地缘传统来说,它的“德”应当是一种焕然彰显、直指人心的道义力量。从这个意义来看,强调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或想在权力竞逐中争夺话语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自己的文化在道义上对他人产生出强大的吸引和诱致力。

[参 考 文 献]

- [1] 贾立政. “中国奇迹”的期待:从政治软实力看中国的强盛[J]. 人民论坛, 2008(2): 20-21.